

學生生活的回憶

郭驥

幼年綽號兆之先生

回憶是甜蜜的，有時也是痛苦的，我的學生生活曲折離奇，不如現代青年的一帆風順，我讀過私立、省立、教會立、國立，以及所謂野雞學校。我覺得甜蜜的是考試和活動獲得幸運的成功，覺得痛苦的是浪費時間，沒有妥善運用我那寶貴的黃金時代，後悔莫及。

八都是浙江龍泉縣最大而比較富足的鄉鎮，約有貳百多戶人家。我出生於小康之家，經營雜貨布疋，生意不差。十一歲，父親病逝，四叔當家。初小畢業，鎮上沒有高等小學，家中送我到離家六十華里的縣城私立養真國民高等小學去唸書，去縣城唸高等小學，當時是鎮上一件大事。母親怕我吃不飽，替我準備了一箱米餅帶去。我初離母懷，隨鄉人進城之便，坐了一天小船到達當時認為已經够大的都市，鄉人把我送進學校，交給校長就走了。那知，我患了「思家」病，寢食不安，不到一週，學生自治會開會，認為我私帶米餅，未曾於到學時向校方報告，高年級同學提出檢

討，使我這個鄉下人精神上感受到嚴重的壓力，就利用這個藉口，不辭而別，潛逃回家。四叔和母親以我一個人孤單，情有可原，未加責難，乃洽商鎮上其他小孩四人，結隊再往，可以互相照料。這次「陣容強大」浩浩蕩蕩進城，我胆子大多了，自信不致再受「欺負」；那知，思家之念，依然存在，我又首先「發難」，潛逃回家。這次，我自知無法使人諒解，從後門輕輕溜入，四叔大為震怒，鞭撻交加。我扒上母親床架的天花板上，不肯下來。母親以夫死未久，而子復不肖；四叔有意培養愛子讀書，却不知自愛，賭狀心傷，淚流滿面，鄰居戚友從此給我一個綽號——兆之先生。每聞此一稱呼，引為奇恥大辱，我不怪他們譏笑，怪自己太不爭氣。其他四位同學也是初次離家，不久也先後回來了。鎮上富翁李鏡蓉先生在他所辦設在祠堂裏的養正小學特別為我們增辦高等小學一班，來解決我們的求學問題。

名爲高等小學，實與私塾類似，只有一位老師，十幾名學生，除唸國文外，別的課程根本不談不上，我在班上算是成績很好的。胞兄駿原在離家二百四十華里的麗水省立第十一中學三年級肄業，後因四叔病故，不得不中途輟學，回家主持店務。

我自高小畢業，就讓我去升學，以振家聲。麗水是處州舊府屬十個縣的首邑，土地有台灣的一半大，却只有一所省立初中和一所省立師範，人民貧困，交通不便，教育落後。啓程之日，家中燃香點燭，拜過祖先，駿哥送我上船，這種小船通常可載旅客二三人，同時運貨，膳食住宿擠在一起，在農村社會裏，這種簡單的交通工具，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公路暢通之後，早已受到自然淘汰了。小船順流而下，兩天半時間，倒不使人感覺孤寂和沉悶。一葉扁舟，浮泛於平靜的河川之中，輕鬆舒暢，遇到水流湍急，偶一不慎，却有傾覆之虞。沿途村落稀疏，山光明媚，鳥語花香，溪流婉曲，風景旖旎。坐在船頭船尾準備功課，空氣清新。疲倦時，縱目遠眺，心曠神怡，欣賞大自然的秀色，另有一番風味在心頭。

到了麗水，住入當時最大的吳祥興旅館，實

際上只有十來個小房間，包括膳食，每天只費毫洋四角。報名過後，考國文算術和史地三課，國文題為「學然後知不足論」，我在試場裏竟然全身顫抖，恐懼得右手幾乎不能握筆成書，打好草稿，勉強謄清交卷。算術是加減乘除，史地也很簡單。考試完畢，患得患失，困坐愁城裏，想到萬一名落孫山，無面見江東父老，心悸不已，澈夜難眠。

發表之日，我甚至沒有勇氣前去看榜。同住考生回來說：「姓郭的考上第一名」，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偷偷去看，證實無訛，內心的緊張情緒，才鬆弛下來，如釋重負。

入學之後，最初一二月，仍很想家，以前有過兩次逃學的慘痛教訓，不能不自我抑制。多數同學住校，比較容易認識，不久就能適應環境，沒有孤苦伶仃之感了。

初中畢業賀客盈門

初中期間，爲了爭取並保持班上第一名的榮譽，清晨五時即起，經常點洋臘燭就讀，其他少數同學，也跟着用功，操場上不易見到我的蹤影，而今身體不夠結實，可能與發育時期不注意運動有關。孫傳芳部攻打浙省督軍盧永祥部，和國民革命軍賴世璜部由贛入浙，兩次逃避兵燹，初中讀書的時間，除去寒暑假，實際上不到兩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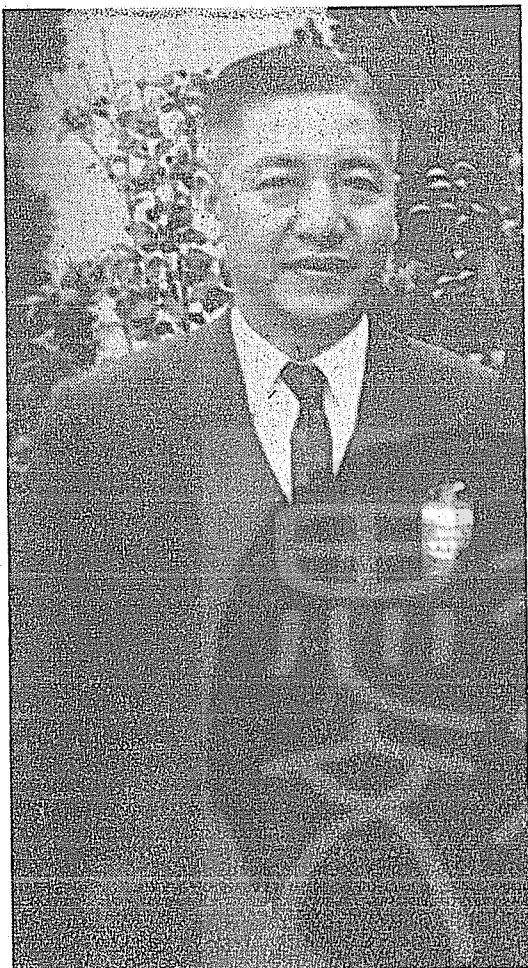
民國十七年底畢業，坐小船回家過農曆新年，逆水行舟，需要六天，冬季嚴寒，到家後發高燒，臥病不能起，母親侍候湯藥，做菜餵飯，無微不至，坐在牀側，百般撫慰，假使病能轉移，她都樂意承受，母愛的偉大，使我永遠難忘。年底前的一天下午，校中門房林文芳送榜來了，一張大宋體字印好的紅色榜示，填了我的名字與名

次，貼在店中壁上，一面敲鑼，一面恭喜，母親扶我起牀出去招呼，笑逐顏開，左右鄰居鎮上親友都來道賀。她很高興，賞給送榜的門房兩塊銀元。全班畢業生四十餘人，散佈在十個縣，他照例要親自送到，長途跋涉，雖然辛苦，但額外收入爲數也頗可觀。這是家中一件大喜事，凡在三天之內前來道賀的人，款待餽飽，表示謝意。

新年過了，我已十八歲，仍坐小船到溫州，再乘益利輪船到上海升學，到達時已是農曆二月初旬，公立高級中學都已招生過了，無校可進，剛巧有同鄉在私立新民大學肄業——一所新辦的野雞大學，只有一棟樓房，設備極其簡陋，管理更談不上，我報名入大學預科二年級下學期，只讀一學期就可畢業。形式上也需要考試一下，英文作文題目，記得是「我的希望」(My Hope)，根本沒有多少學生，錄取是不成問題的。寫信回家，報告經過，駿哥寄來一千多字的長信，備加斥責，認爲我不該好高騖遠，豈可進入有害無益的野雞學校，浪費時間與金錢？他要我在滬補習半年，再入著名的高中就讀，奠定良好的學業基礎，以便將來投考國立中央大學。我看完這封手足情深的長信，大爲感動，潛然淚下。

轉瞬又是暑假，我在開北南洋高商補習英文，同時準備考試，我拿了這張並未立案的預科畢業證書，徬徨在十字街頭。再從高一唸起，年齡已屆十八歲了，實在沒有興趣。私立大同大學，在上海也是有一點名氣的，預科兩年畢業，假如在該校繼續唸下去，大約一年餘可以讀完預科學分，乃報名應試，僥倖錄取了。後來私立之江大學復校成功，登報招生，預科一年畢業，我以教育部次長朱經農先生兼任校長，想來立案應無困難，遂決定報考，錄取之後，乃捨大同而就之江。

郭驥先生：浙江龍泉人，歷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教授，現任國民大會主席，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秘書長暨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我國代表團秘書長。



最愉快舒適的日子

之江大學是教會學校，校址在杭州，背山面水，風景幽美，錢塘江邊，孤帆遠影；六和塔下，鳥語蟲嘶，每當紅日初升或夕陽西下的時候，徘徊徜徉于松林花卉之間，有如悅耳歌聲，動人心弦，使人陶醉。

預科分文理兩組，我讀文組，教授多是美國人，我的英語及其他課程的基礎，因為跳班越級關係，本來很差，聽課似懂非懂。這一年我浸沉在山明水秀美如公園的環境裏，心境寧靜安閑，胸懷爽朗豁達，是我求學時代最感愉快舒適的一段日子。

可惜好景不常，爲了宗教問題，之江也鬧短暫的罷課學潮，朱經農校長辭職，李培恩先生繼任，畢業後依然沒有立案，依法不能投考國立或公立大學，使我感到失望與困擾。上海市教育局後來受了輿論的影響，爲解決青年就學問題，舉辦私立立案私立高中以上學校畢業肄業學生甄別考試，依照程度高下錄取，使學生獲致投考或插班公私立大學的資格。

我很幸運，甄別考試結果，證明我的程度與公立或已立案的高中畢業相等，可是發榜太遲，公私立大學都已招生過了。上海只有光華大學續招新生，我就拿着甄別及格證書，前往報考社會學系，因爲我是以服務爲人生觀的，我認定爲社會大眾服務，乃是人生的一件樂事。

光華在上海私立大學中算是有相當地位的，規模頗大，我考取之後，搬入宿舍，過着正常的學生生活，家中仍不滿意，期望我入中大，至低限度要入國立大學，才符合他們的要求，我自己也有這個抱負，讀書確實相當用功。有一天晚上，同房間的穆時英（寫「南北極」小說著名，抗日期間投靠偽組織，在滬被刺死亡）、施祖麟（聽說在台教書）、鮑國樑（已故）要去輪盤賭場，他

們都是摩登青年，跳舞、打牌、談戀愛、開汽車，這些時髦的玩意兒，無所不能，只有我是個鄉下人，是書獃子，除整天與書爲伍外，別無所知，道貌岸然，一絲不苟，他們約我同往，我初不肯去，他們也表示不願把我帶壞了，僅是請我做監督，看到他們贏錢，立刻逼迫他們回來，經他們花言巧語一番勸說，我爲了好奇，去看一下無妨，也就欣然接受了。他們很老腔，門檻亦精，我與他們到法租界一個賭場，規模宏大，佈置雅緻，尤其是年青貌美的小姐，侍候週到，名煙醇酒，任君選擇。我這個鄉下小伙子，第一次看到這種豪華富麗的場面，大開眼界。裡面設有大約二十個輪盤桌，分別圍繞着許多賭徒，我們這幾個人，坐在一邊。我還不知如何賭法，後來看懂了，實在很簡單。押錢的範圍愈小，輸的機會愈多，贏的倍數也愈大。我看同去的同學有兩位已贏了三百多元，我就行使監督權了，一再催促罷手回校，他們賭興正濃，手氣又順，那裡就肯罷休？我等得不耐煩，自己也手癢了，情不自禁，竟拿出一元押着試試看，當然是範圍最大，贏錢倍數最少的，一元賠一元，結果贏了一元，再押又贏，大爲興奮，繼續押下去，無形中自動放棄了監督權。最後大家輸得精光，空手離開，沒錢坐黃包車，只好走了一小時多的路回到學校，滿身臭汗，大家帶着疲憊和懊喪的心情，熄燈就寢。

從光華大學到中大

光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潘光旦博士，以原本社會學入門爲教材（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他把這本書唸得爛熟，上課時不用翻開書本，侃侃而談，如數家珍，我懂得一些，但沒有全懂。當時沈昌煥兄也在光華唸書，正和他未來的夫人黎佩蘭小姐在戀愛中，才子佳人，卿卿我我，常在學校內外並肩散步，自爲一般同學所羨慕。那時，我根本不活躍，十足是鄉下人，

當然不會與他們認識。一年很快就過去了，我要貫徹我的既定目標，轉入國立中央大學，來滿足家人親友的期望。轉學之前，我沒有絲毫把握，決定在上海先考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社會學系一年級，作退而求其次的打算，出乎意料之外，竟列該系錄取新生的首名。招收轉學生，向例是在開學之前，招收一年級新生發榜之後。我預先用通訊方式辦好轉學中大報名手續，對外則說是準備北上。臨行的前一天下午，我忽然想起中大社會學系主任是孫本文博士，我未曾看過他的任何著作，未免荒唐，因此，就跑到四馬路世界書局買了一本他著的社會學ABC。第二天上午，同鄉好友到北站送行，都以爲我是去北平的，不知道我會到南京下車。我在特別快車上開始特別快看這本社會學ABC，車抵南京，這本書剛好看完了。由下關進城，住在中大附近丹鳳街一個小旅館裡。第二天考試，第一門課就是社會學，第一個試題大意是改造社會，就理論上講，約分二派：一爲優生學派，一爲文化學派，孰是孰非，試申論之。註明該題分數佔百分之五十。我看了十分開心，如中愛國獎券。潘光旦博士屬於優生學派，認爲構成社會的份子是人，身體不健康的人不准結婚，社會自然健全了。孫本文博士主張剛剛相反，以爲人的本性，無所謂善惡，社會構成份子，受後天的文化教育影響最大。要改造社會，須從教育文化入手。我當然依照孫教授的意見作答，其他三個試題及其他幾門科目，社會學ABC裡都有談到，我剛看過，還有一點印象，自信答案不致有太大的差錯，一天考完，回到小旅館，覺得幸運之至，非常快慰。民國二十年秋，南京剛在大水災之後，滿目瘡痍，我既舉目無親，又不知遊樂場所之所在，這晚，埋頭就睡，睡得很甜。過了兩天發榜，轉學生取了十六名，我列第六。假使我不是心血來潮，買了一本孫主任的著作來臨時抱佛脚，而照潘主任的看法作答，失

敗是自然的結果。我以為考試應以各該學科的基
本知識為範圍，在學術上有爭論的問題，因為見
仁見智之不同，似乎是不宜作為命題的題材的。
從此，我在南京住下了，家人皆大歡喜；滬上同
鄉好友，也大為驚奇。

我到中大是一張白紙，沒有一個朋友或同學
，裡面的社團組織和活動，更是茫然無知。入學
註冊，住校內田字房宿舍，雖然是二年級了，到
底是新生，安分守己，潛心讀書。半年後，本系
三年級同學楊德超兄介紹我和季士偉、孟昭瓚、
蔣百幻、張德瑛（女）、項本善等同學認識，偶有
來往。我很熱心服務，奔走亦勤，常在幾個宿舍
裏訪問逐漸認識的同學。用錢也還大方，在附近
餐館吃麵，遇到熟人，喜歡付麵票請客，熟友愈
來愈多，交遊也愈來愈廣。

我進中大，校長還是朱家驊先生，後來經過
幾次學潮——東北發生九一八事變，京滬學生愛
國情緒激昂，紛紛請願，要求對日抗戰，中大同
學結隊到外交部打部長王正廷，新任校長段錫朋
到職被毆，政府派魏益三將軍來校為總教官，實
施軍事訓練，這一連串事件使學校擾攘不安。一
般同學的心理，漸覺厭倦，頗有動極思靜之意。
羅家倫校長適于此時發表，順利接任，力圖整頓
，浮動之局，趨向平息。

同學們的社團活動

中大以前有兩大政治性團體——極光社，接
近改組派；新聲社，靠攏組織部，過去為爭取學
生運動的領導權，聽說這兩個團體競爭得很激烈
。我進中大，這兩個社團的負責幹部，多已畢業
離校，似乎煙消雲散了。後來知道有一個民力社
，純以敦睦學誼為宗旨，共有二十餘人，楊德超
兄介紹我認識的幾位朋友，都是社員，後來我自
然也應邀參加了，沒有任何手續，每月敘談一次
，過後我才知道民力社的社員，有幾位以前與極
光社有關。當時中大內部的複雜，可說是中國現

實政治的縮影。

哲學系周植亭同學于民國廿一年夏，要我加
入中國國民黨，請張道藩、余井塘等先生介紹，
我從未和他們見過面，一切手續，由他包辦。入
黨之後，校中兼任教授雷震先生競選南京市黨部
委員，我曾受他之託，為之拉票。一年過後，我
覺得學能是兩件事，有學問的人，不一定有能力
辦事；反之，有辦事能力的人，不一定就有學問
，學能兼備，始為全才。抽出一部分時間來為同學
服務，訓練自己的辦事能力，在教育原理上未嘗
沒有價值。因此，我一變埋頭讀書的態度而忽然
活躍起來，與同班同學周石泉兄競選系同學會的
常務幹事，我成功了。進而競選全校學生自治會
的幹事，發生選舉糾紛，學校當局宣布選舉無效
，定期重選，校方暗中開票，傳說我得票最多。
重選結果，我還是高票當選。我迭次當選，社團
作用有限，主要原因是中大有一個特點而未為一
般人注意的，那就是同學比數，來自南京中學與
揚州中學的特別多，只要與這兩個中學出身的同
學，培養友誼，多取聯繫，拜託他們去拉票，選
舉是必然勝利的。

民國廿二年的學生自治會幹事會選舉我和項
本善、王發龍等九人為常務幹事，實際上是由我
多負一點責任，經常開會，設法為同學服務，
真也做了一點事情。北大、清華的學生是沒有
學費的，惟有中大學生每一學期需繳學費十元，
我們認為同是國立大學，不應差別待遇，要求援
例比照免繳，推代表五人去謁見校長，我首先說
明來意。羅校長大談其近來學校建設，有意規避
正面答覆我們所提的問題。劉毓明同學是個激烈
份子，硬把羅校長的延宕戰術，拖回本題，並疾言
厲色的表示：「校長說最近買了許多新出版的西
文書，不但學生看不懂，恐怕連教授也看不懂。
梅庵那種環境，只宜配合茅屋數間，才顯得幽雅
，校長却造了洋房作為音樂教室，實在是破壞了

風景。校長說已聘了好幾位名教授，不知名在那
裏？」此言一出，空氣立刻緊張起來，羅校長急
了，氣憤憤地說：「你，你，你們，你們，你們
鬧好了，你們鬧好了。」我心平氣和的出來說好
話，打開僵持之局，當時雖然覺得不太愉快，未
獲具體結果，最後到底是減免了。十年前，羅老
師任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我任中央委
員會副秘書長，時常碰面，有一次我會和他談起
這件事，相顧莞爾而笑。

無故被拘留一星期

這一年除上課外，可說沒有讀書，主持學生
自治會，所耗費的時間精力實在太多，與我原來
讀書與歷練兼籌並顧的構想，大相逕庭，本有不再
繼續之意，乃因原任幹事，均成好友，一再慫恿
，始有復出之議。不意竟因此出了岔子，引起軒
然大波。楊德超兄以前亦曾遭人密告，被捕入獄
。有一天星期日的早晨，同村首富吳文苑兄來京
遊覽，秋高氣爽，我請他到雞鳴寺喝茶，一覽勝
蹟，正在暢談的時候，忽有一個穿着西裝的陌生
人前來問道：「你是否姓郭？」我沒有承認也未
否認說：「有什麼事嗎？」他說：「我有事奉商，請
你到門口去一談。」門口也站了一個人等在等，
他們看左右前後無人，就拿出手槍對着我說：「
跟我們下去。」到了山脚，一輛破轎車停在路旁
，我坐在中央，他們兩人各坐一邊，用布遮蓋我
的眼睛，疾馳而去。當時我並不知道驚慌，因為
我心裏明白，我沒有參加過任何反黨反政府的任
何政治團體。大約一刻鐘之後，車停下來，我進入
一區平房院子，兩面是廂房，作為寢室，後面可能
還有房間，每室可容五六人，中間是會客室，作為
餐廳，每餐兩桌，飯菜都好，顯然不是監獄，也不是
拘留所，與感化院相似，住在裏面相當自由，可隨
意選擇閱讀放在書架上的書籍，可是沒有報紙，
不得與住在裏面的人高談闊論。我大約住了一星

期，只有一人先後來問過二次話，內容都很簡單，詢問入黨的經過，與參加學生自治會的情形。有一天晚上十一時左右，有人來說：

「你可出去了，請你在這張紙上簽字。」

我接過來一看，內容大意是此事經過，要絕對保守機密，如對任何人洩漏，願受最嚴厲的處分。我照辦了，門口停了一輛轎車，這次只有一人陪伴，沒有掩蓋眼睛，在小巷裏轉了幾個彎，送我到大門口下車，我推想這個地點是在夫子廟附近。

到宿舍，發現駿哥已由家鄉趕來，睡在我的床上，看我回來，驚喜交集。我才知道在我失蹤期間，鬧得天翻地覆。學生自治會登報尋人，由校長室鬧到中央黨部。我為躲避記者包圍訪問，第二天早上就溜到上海友人處暫住了，兩週後回校上課，還我初服，不再預聞自治會事。是夏，獲文學院績優獎金。翻譯烏格朋（Ogden）著「社會選變」（Social Changes）一書，原擬以此稿代替畢業論文，後來發覺前期同學劉渠先生已經譯竣付印，乃改寫論文——失業問題的研究。

外界人士與校內同學把我看成是一個複雜的人物，頗多臆測。有人說我是CC。又有人說我是改組派。軍校畢業而考上中大的況汝霖同學一度和我接近，有人說我是復興社，也有人懷疑我與共產黨有關。其實，我什麼都不是。當時我根本不知道這些團體的歷史背景和實際情況。近幾年來，有許多青年莫名其妙地無辜遭受冤屈，實在使人惋惜。我有一位舊部，原在廈門大學畢業，留日回國，曾在我任湖北省政府人事處長時共事。大陸淪陷後，他在台糖公司嘉義酒廠擔任人事室主任。他有一位同學在廈大參加過共匪幕後策動的讀書會而被捕，訊問時參加現來台灣的還有什麼人，他被提及了，跟着被捕，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幾至家破人亡，好慘！我覺得負有共

黨使命的首要分子，應該嚴辦，罪有應得；若只是給同學拉去湊熱鬧，或者是書獃子，顧名思義參加讀書而根本不知內情的，應予從寬免究。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論，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不夠成熟，容易受人利用，知道的事情實在太有限了。

四年級時，我曾想談戀愛，解決婚姻問題，可是從來沒有交女朋友的經驗，胆怯，缺乏鏗而不捨的勇氣與精神。我追求過同系同班的一位女同學，到女生宿舍去看她，要起個大意，看到時，心裏高興；未碰上或打電話不在時，就懷疑她有意規避，因此就心灰意冷了。我對另外一位女同學，也曾寫過一封信，附寄舊詩，未得反應，畢業在即，功課也忙，就此停止進行了。

民國廿三年初夏，舉行畢業典禮，羅校長敦請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蒞臨致訓。他穿着白色西裝，豐采飄逸，予人以美男子的感覺；尤其是致詞，沒有準備講稿，口若懸河，出口成章。他講國內外情勢與青年責任，全體畢業同學，大為感動；女同學看到他的儀態柔和，更是交相讚美。畢業同學預先推我致謝詞，當時找工作十分困難，畢業就是失業，大家心裏都有這種恐慌，為了表達同學的心聲，我要求政府輔導就業，這種場合，提出這種問題，事後思之，頗覺措詞不太得體。

一般同學都想在南京找到一官半職，實際上僅有極少數的人能够達到目的，我自然無法例外。趙志堯先生介紹我去謁見正在廬山海會寺舉辦暑期軍官訓練團的陳辭修將軍，他着灰色土兵軍服，繫綁腿，穿草鞋，我起初誤以他為勤務兵，握手坐下，我才恍然大悟。我剛從家鄉出來，他問我兩個問題：一、穀賤傷農的補救措施。二、青年抗日情緒。我報告了我的看法，並要求資助出國留學。他對我的談話似乎相當滿意，當即表示：

「你跟我做事一二年，可多了解國家社會的

實際情況與需要，也可多認識一些朋友，再出國求學，對你的將來會有更大的裨益。」隨即派我為秘書處第三科同少校科員，承辦收發文書，及編輯工作。他對官階向來嚴格，認為「國家名器不可太濫，多拿一點薪水，倒是無所謂的。」大學畢業生初到辦公廳下做事，照例是上尉，對我來說，少校是特別優遇的了。暑訓團結束，辭公赴江西廣昌，留我在廬山編輯「廬山訓練實紀」。二個月後來電調我到前方，擔任侍從秘書，接受考驗。

遠渡重洋留學英倫

民國二十五年夏，辭公要我留在武昌南湖陸軍整理處負責編印「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講稿，這是委員長命他在峨嵋軍官訓練團主講的，經過好幾位要人的斟酌補充而成；同時叫我準備赴英留學。當時辦理留學手續，只向教育部申請留學許可證，再向外交部請發護照，送往簽證即可，非常簡便，不如現在辦理之繁難。八月中旬，我在上海登上意大利郵輪康德斐地號（Count Verde），看到裡面佈置的堂皇富麗，目為之眩。航行二十一天，經過印度洋，紅海，蘇彝士運河，地中海，每到一個大都市，至少停留半天。兵工署派往德國研究的周其棠、嚴濟存、羅國華、盛玉庭、陳善淵等兄同輪認識，每到一埠，必結伴登岸同遊，分攤車費，經濟實惠，此行身心舒暢，非常愉快。到馬賽後，分道揚鑣，我一個人像劉佬佬遊大觀園，單獨搭火車到瑞士羅桑下車，已是暮色沉沉，我手提兩只箱子，看到火車站對面有一個「大陸旅社」（Hotel Continental），我就鑽了進去，開好房間，在餐廳用膳。在大學裡，我雖然也唸過兩年法文，可是茶房送菜單來，根本看不懂，他問要這樣嗎？我說是（oui），要那樣嗎？我也說是。我不喝酒，他却把酒瓶開了。送上好幾道菜來，多數擺在

桌上，我吃不下，旁邊的客人對我瞪着眼，莫名其妙；茶房也以為我一個，點了這麼多菜，覺得奇怪。最後付賬，這一餐花了大約十美元，當時美金值錢，真是啞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我們中國人，不管對不對，不管要不要，對人習于說是。西方習慣，表示要的時候，說 yes, please, 不要的時候，說 no, thank you. 老師未曾將日常生活用語告訴我們，所以易鬧笑話。初到國外，除教會學校出身者外，多數留學生的英語，能看能聽能寫，不一定能說，對外國人老是說是，常使他們啼笑皆非，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從瑞士遷赴倫敦，往中美協會(China Institute)，負責人張似旅先生介紹我到鄉間蘇里(Sury)住在賀爾太太(Mrs. Hoare)家裡，她已七十五歲，和一位七十歲左右的弟弟泰勒先生(Mr. Taylor)同住，利佛浦大學名教授路克斯貝(Prof. Ruxby)和他們是至親。路教授是地理學專家，尤其是中國地理，造詣很深，熱愛我國，曾到重慶南京，抗日戰爭結束，不幸以心臟病逝世了。我在鄉間住了二個月，未與任何中國人見面，專心學講英語。不能表達心意時，依賴手勢幫忙。這樣勉強練習，確有顯著進步。賀家人口簡單，雇用一名愛爾蘭女傭，有一天晚上，飯後圍桌閒談，女傭發現有一封信，上面的郵票漏蓋戳記，就想取下繼續使用，賀老太太立刻把信搶過去，用鋼筆把郵票劃了一下，並對她說：「寄信應付郵資，豈可取下再用貪小便宜呢？」英國人的守法精神，使我肅然起敬。

英國學制，每年分三個學期，我向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註冊，改習人事行政。我覺得所有機關與事業的成功和失敗，主要關鍵在人。我國政府，人事不上軌道，以致頻年混亂，難臻政治。讀博士學位，時間太長，決定唸碩士學位(M.Sc.)，校方指定著名行政學家范納博士(Dr. Herman Finer)為指導教授。英國學制與美國不

同，雖然也有 BA, M.A. Ph. D. 等學位，多為外國學生而設，另有 B.Sc. M.Sc. D.Sc. 學位，則水準較高，比較困難。唸 M.Sc. 學位有兩種方式：一為寫論文一篇，另考試兩門課目，加上口試。二為不寫論文，平時寫讀書心得報告，考試四門課目，加上口試。我考慮到寫論文，須定題目，找資料，詳加研讀，動筆草擬，荒時費事，不如採取第二種方式較為簡單，成固可喜，敗亦無所謂。范納博士的名著是「現代政府的理論與實際」(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s)，分兩厚冊，一千數百頁，資料豐富，洋洋大觀。

拉斯基教授(Prof. Harold Laski)講政治思想史，天分極高，記憶力特強，一上課室，不用課本，如數家珍。他著了「政治範疇」(Grammar of Politics)等好幾本不朽之作，每本只有二三百頁，我曾聽到他開范納博士的玩笑說，一本著作，本來二三百頁就可說得清清楚楚，若讓范納博士去寫，非三千頁不可了。他們倆人的性格完全不同，前者是孜孜兀兀，用苦工夫成名；後者則全靠聰明才智，觸類旁通。

『買』中了一位賢內助

入學未久，日本軍閥明目張胆挑釁，觸發蘆溝橋七七事變，我國被迫開始全面抗戰，我曾打電報請示陳辭公，是否須即返國効命疆場，覆電指示，來日方長，希安心向學。

留英期間，經常在一起的還是幾位中大老同學，如余紀忠、楊德超、張宗良、孟昭璣、季士偉、蔣伯幻、吳文暉等兄，我們大多同住一區，同讀一校，下午喝茶時間，臨時約在學校附近咖啡店小敘，談談國內外時事，互有進益。德超兄與宗良兄是同鄉至好，關懷備至，我認識宗良兄是他特別介紹的。他說宗良兄研究學問，能專注深入。抗戰開始，經濟來源困難，他找我為宗良兄設法

俾可完成學業，當時安徽教育廳廳長楊廉先生，是郭懺將軍的聯襟，郭將軍任辭公的辦公廳主任，我寫信給他，請其轉介，果然獲得獎助。宗良兄學成回國，也是他要我寫信向辭公推荐的。大陸將要淪陷，德超兄到香港，我曾辦好入境證寄去，並電促來台，終因家室之累，回到重慶，後來竟被槍殺了。項本善兄沉默寡言，思慮周詳，與我一起從事學生運動，民國二十九年秋，我任第六戰區政治部主任秘書，荐他任第二組上校組長，于到差途中，在蕪江翻車喪命，這兩位素為我所欽敬的同學，遭此不幸，為國惜才，時深悼念。

每年暑假，選擇一個國家旅行。民國廿五年夏，我和吳文暉兄赴柏林，學習德文，並與同船來歐的幾位朋友敘晤，戰前柏林馬路整齊，兩旁樹木參天，碧綠成蔭，令人神往。這時，正是墨索里尼訪問德國，希特勒熱烈歡迎，晚間在奧靈匹克體育場舉行羣衆大會，發表演說，我幸運地搞到一張入場券，到時發現坐在我旁邊的還有一位程崇道女士，接談之下，才知她是農業專家，以後在南京彷彿還見過她一次，從事教育工作。墨希兩魔趾高氣揚的態度，咄咄逼人的言詞，和德國人民傲慢狂熱的氣概，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的呼聲不斷，就已隱藏着後來慘敗的危機。

民國廿六年夏，我去巴黎學法文，住國際學生宿舍比利時館，巴黎的古蹟名勝，美不勝收。中大同學鮑覺民兄由英赴意，到威尼斯(Venice)接太太，道經巴黎，介紹在巴黎習畫的袁樞真小姐和我認識。他與她的哥哥袁賢能教授在南開大學同事，交誼甚深。不久，她赴比利時渡假，歸來之後，我們稍有來往。法國當時發行愛國獎券，我回倫敦，經常寫信託她買獎券，從來沒有買中獎券，我却因此『買』中了一位賢內助。

一般中國留學生大都犯了一個通病，那就是不願意與外國學生保持接觸，喜歡與中國同學混在一起，無異把自己孤立起來，主要原因，我想

不外乎是一、經濟比較困難，與外國同學來往，需要花一點錢；二是語言表達能力不夠，不開腔，他們不知道英語程度的好壞，不講不錯。實際上，外國語言說得流利是由多講來的，不講，永遠不會講得流利。最近，美國加州福祿頓學院語言教員白露梅小姐（Miss Ludmilla Orloff Bradley,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or, Fullerton College, California）前來訪問，她是語言專家，在美教俄語、法語，這次來華學中國話，說得不差。她說在她的學院裏中國學生很保守，不太樂意和美國學生交往，證明與我做學生時代的情況大致相同。

民國廿七年的暮春，我與陳勉修兄去懷特島（Isle of Wight）渡假，這是一個離倫敦不遠的小島，我忽然覺得太不活躍了，應該設法打入英國學生的圈子裏面去，參加他們的社交活動，才可了解他們的學生生活。我去學跳舞，五先令一小時，我沒有一點基礎，跟着女教師跳，跳得蠻自然，覺得這玩意兒很容易。學了兩次，自以為已有把握，不必多花錢了。返校後，我鼓起勇氣，報名參加舞會，請了一位女同學共舞。我左手握着她的右手，右手貼在她的背上，擺好舞姿，她等我開步，我候她起舞，她說：「跳呀。」我說「跳呀。」她看我仍無動靜，才知道我是土包子，帶着笑容說：「跳舞要男的領先，女的跟着來。」這一下可把我難住了，一曲未終，踩了她的腳好幾次，每次我說「對不起」，她說「那是我的錯。」這種謙虛容忍的態度，反而使我覺得不好意思，英國人的君子之風，從這些小地方充分表現出來。我從此不敢再跳舞了，一直到了台灣，才跟立委莫淡雲女士，已故華興育幼院長黃若瑛女士學會了交際舞，才體會到要想跳得步伐輕盈飄逸，並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容易。

最風趣的一次郊遊

中國留學生租屋居住，除上課與在圖書館看書外，很少與外國學生交往，根本不知道他們的生活狀況，校中同學發起郊遊（picnic）我也硬着頭皮報名參加，目的在想和他們打成一片，獲得更多的了解。約有四五十位同學在校門聚齊出發，各國學生雖然都有，英國學生仍佔絕對多數，中國人只有我一位。此行很有風趣，在碧綠的草原上輕鬆漫步，談笑自如，使我了解到青春的可愛，中國學生勤讀苦唸不够活潑的錯誤，和我自己英語程度的低落。我是其中唯一的東方人，他（她）們都以好奇的心情來接近我，和我聊天。有一位同學開我玩笑，表示歉意說：「對不起，我開你玩笑。」（I am sorry, I am pulling your leg.）這是土話，我不明原意。我說：「你不必說對不起，你根本沒有拖我的腿呀。」大家哄然大笑，我却莫名其妙，同學隨後解釋，我才瞭然。跟着，另外一位女同學說：「You are not green, are you?」我答：「Of course not, I am yellow.」又是一陣笑聲，green 這個字，一般只是綠色的意思，却不知另有愚蠢（foolish）的含義，她的意思是：「你不愚蠢吧？」我却誤為「我當然不是綠色，我是黃種。」假使他們不相信我是真的不懂，還以為我是幽默大家呢。

范納博士耐心地指導我讀書，核閱報告，每一學期約見二三次，先後兩年多。民國廿八年初夏，他通知我可以應考，依照規定，邀請劍橋大學兩位教授前來口試。他坐在旁邊作陪，問答約一小時，有的問題我答得很好；有的則不够完滿，看他的表情，有時替我乾焦急，甚至插嘴代為補充說明。口試結束，三人會商了幾分鐘後，分別向我握手道賀，我知道過關了，欣然有喜色。這時，歐洲的局勢已非常緊張，國內的抗日戰爭，武漢撤守，政府播遷重慶，也已進入艱苦階段，我就準備返國。英國政府為協助留學生回家，透過文教團體通告，可以申請免費坐船。我遂於八月初赴法，在馬賽港搭上藍煙公司（Hector）的貨輪返國，沿途裝貨卸貨，航行了一個多月才到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我由港搭輪到河內，再乘火車到昆明，從昆明坐柴油車到重慶，途經吊死岩，七十二倒拐，翻山越嶺，危險萬狀。翻落在深山峽谷的車輪殘骸，隨處可見，我們總算幸運，安全到達了戰時的陪都，從此開始了我的公務生活。

我寫這篇回憶，把我的學生生活坦誠率直毫無保留地和盤托出，旨在作為個人的反省、檢討、與回味；我在小學初中，因為師資設備太差，未能奠立良好基礎；又因學潮戰亂，無法安心求學，以致老大徒傷悲！現在在學青年，比我當年讀書的環境與條件，實在好得太太多，太幸福了，希望以我為前車殷鑑，青春不再，珍惜前途，好自為之。

編輯部啟事

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有趣；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最長以壹萬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
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七七一二
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